西夏華嚴經論及其傳承研究1

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教授 崔紅芬

摘要

西夏佛教興盛,漢傳和藏傳佛教都一定發展,西夏先後六次向中原王朝請賜「大藏經」,開設譯場,翻譯佛經。西夏境內流行的佛經有漢文、西夏文和藏文等不同版本。西夏滅亡,遺民散居在各個地方,佛教信仰依舊。為了滿足西夏遺民誦讀、供養佛經的需要,蒙元統治者也多次刊印西夏文佛經,並散施河西地區流通。本文從三部分對西夏故地遺存西夏文、漢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及其注疏等進行梳理,考證《華嚴經》不同版本及帙號等,確定西夏時期曾經存在西夏文藏經,並形成一套帙號體系。結合對「華嚴懺儀」題記、塔銘以及洞窟題記的分析,考證了在西夏時期傳承華嚴的諸多僧人。

關鍵字:西夏、華嚴經論、帙號、傳承

¹ 本論文為2012年國家社科基金研究專案的階段性成果,課題號12BMZ015,並獲2012年"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資助。

因無正史記載,西夏成為長期被人們忽視的王朝,直到 1907~1909 年科茲洛夫率俄國探險隊在我國黑水城掘獲大量西夏文獻和文物,這批文獻運抵俄國後引起學界的關注,也拉開了國內外學界對西夏研究的序幕。黑水城文獻主要有俄藏、英藏和中國藏三大部分,佛教文獻占絕大多數。此外,銀川、靈武、賀蘭、武威和敦煌等也陸續出土大批珍貴西夏佛教文獻。

本文要探討的華嚴經論就是其中之一,王國維的〈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殘 卷跋〉一文對上虞羅氏、仁和邵氏並藏西夏字經折本「大方廣佛華嚴經」進行 初步考證,認為是元代刊印之物,非西夏原品,應是管主八負責刊印的。²羅 福成《各家藏西夏文書籍略記》也提到杭縣邵氏和上虞羅氏藏西夏文「大方廣 佛華嚴經」。3羅福萇對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進行夏漢對譯釋讀。41932 年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之「啟事」提 及:「民國十八年秋,本館購入寧夏發見之西夏文佛經百餘冊,皆屬宋元舊 槧,蔚然成為大觀。」但「啟事」並沒有記述購入過程、地點等具體情況。周 叔迦《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對「大方廣佛華嚴經」有收錄。5王靜如《西夏文 木活字版佛經與銅牌》對寧夏收藏兩包佛經的收藏情況作了介紹,並考證其題 款、格式和活字版特徵,認為是靈武出土活字版「大方廣佛華嚴經」。牛達生 先生還對羅雪樵藏卷及靈武出「華嚴經」的版本做了考證研究。6張思溫對其收 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來源、版本及裝幀做了簡要介紹。⁷白濱則根據 當事人留存的著錄、研究著作和會議文章探討了靈武出土西夏文佛經文獻的出 十時間、地點、數量、種類,及國內諸家收藏和流失海外的情況等,對已有定 論的元刊活字本「大方廣佛華嚴經」的時間問題提出質疑。8西田龍雄對日本藏 11 卷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全文進行釋讀研究。⁹本文欲在前輩學者的 基礎上,通過對西夏遺存華嚴經論梳理,考證華嚴經典在其境內刊刻流傳、師 承情况及相關問題,不妥之處,敬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大方廣佛華嚴經》,又稱《華嚴經》,中國歷史上先後多次進行翻譯,

²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21,頁519~520。

^{3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頁361。

^{4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頁179~184。

^{5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頁259~318。

⁶ 牛達生, <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發現研究及版本價值>,《印刷與設計》1996年總120期。

⁷ 石宗源主編,《張思溫文集》,頁374~376。

⁸ 白濱, <寧夏靈武出土西夏文文獻探考>, 頁92~99。

^{9 (}日)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2冊),1975~1976年。

存有不同版本。其一是《晉譯華嚴經》、《六十華嚴經》或《舊譯華嚴經》, 東晉佛陀跋陀羅於義熙十四年(418)在揚州開譯,南朝宋永初二年(421)譯 畢,50卷,慧觀等校定重審,開為60卷,二者同時流行。其二唐實叉難陀等 在證聖元年(695)至聖曆二年(699)間譯《華嚴經》(八十卷)。其三唐般若 譯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後來四十卷《華嚴經》最後一品《入不思 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漢文單行本單獨流傳。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及其相關論疏等在黑水城等西夏故地出土佛經文獻中存有不同版本。

一、《大方廣佛華嚴經》

(一)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

俄藏西夏文有第 84~90 號,西夏特藏 349 號,譯自漢文,見《大正藏》第 279 號,即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西田龍雄《西夏文佛經目錄》第 63 號;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經》第 258~888 頁。¹⁰綜合分析,俄藏黑水城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分為三種裝幀形式:

1.寫本-經折裝:第 84 號,存 40 卷,經文中無施寫發願者、抄經者及準確年款等資料,只提到了仁孝皇帝的尊號(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制義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有帙號。

第85號,共80卷,使用單獨1套帙號,使用《華嚴經》的第2種帙號。經文曾有一次用草體指出擁有者的名字略□屈那(Мэ...Кхви-нги),曾有兩次用草體指出抄經者名字□移尚(мбуоШио)、囉那征(Ра-ндон-ндзин)。保存完整的卷數有第1、4、8、10、13、17、19、20、23、24、26、28、32、35、37、51、54、55、57、72、77、78、79、80卷。無年款記錄,有仁孝尊號(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制義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有秉常皇帝(就德主國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及其母梁皇太后(天生全能錄番佑聖國正皇太后梁氏)或(天生全能錄番式法國正皇太后梁氏)的尊號,□說明這組佛經譯自11世紀中葉的秉常時期。

第 86 號存 1 個館冊號,有仁孝皇帝(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制義去邪醇 睦懿恭皇帝嵬名)尊號。

2.刻本-蝴蝶裝:第87號,1個館冊號。有「人慶乙丑二年(1145)十月十七日重校施,仁孝皇帝(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制義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

¹⁰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стр. 301.

¹¹ 崔紅芬、文志勇, <西夏皇帝尊號考略>, 頁9~13, 全文被人大複印 資料《宋遼金元史》,頁49~56。

尊號再御覽並散施官吏民眾」。

3.寫本-貝葉裝:第 88~90 號,正反面書寫,存 2 千多頁,有帙號,每頁正面寫有帙號和頁碼。發願者魯李尚嵬(Леы-лие Шион-вай),抄經者麻吉江?寶(Ма-нгиу?-лдиэ)、金吉祥全(Вон-нгиу Ру-чиван)等。秉常皇帝(就德主國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及其母梁皇太后(天生全能錄番佑聖國正皇太后梁氏)禦譯。仁孝皇帝(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制義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校勘。12

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多次提到由秉常皇帝及其母禦譯,仁孝皇帝校勘。秉常(1068~1086 在位)八歲繼位,其母梁氏垂簾聽政,秉常母卒于天安禮定元年(1086),通常情況下,秉常和其母的尊號基本上都是一起出現的。可見,《大方廣佛華嚴經》最晚在秉常時期已被翻譯成西夏文。及至仁孝皇帝使用「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制義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尊號校勘。據考證帶有「制義去邪」的尊號從大慶二年八月(1141)以後才開始使用,大慶年間仁孝開始大規模的校勘佛經,同時也進行了小範圍的譯經活動。¹³

俄藏黑水城出土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刻本-卷軸裝, TK-88)。

(二)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

《英藏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有: Or.12380-3702a (K.K.II.0257.k)、Or.12380-3702aV(K.K.II.0257.k)、Or.12380-3702b (K.K.II.0257.k)、Or.12380-3702bV(K.K.II.0257.k)、Or.12380-3702c (K.K.II.0257.k)、Or.12380-3702cV(K.K.II.0257.k)、 Or.12380-3446RV(K.K.)、Or.12380-2179RV(K.K.II.0265.j)等。¹⁴這些殘經都是唐 實叉難陀譯八十《華嚴經》,分別為卷第 2、11、46、47、48、75 等內容。

(三)中國藏西夏文、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

1.中國藏西夏文有: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主要出土于 寧夏靈武,分別收錄在《中國藏西夏文獻》(6~11、12、13、15、16冊)中, 存卷第 11、12、14、15、16、19、20、21、22、23、26、27、28、29、30、

¹²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rm ctp.301} \sim 317$.

¹³ 崔紅芬、文志勇,<西夏皇帝尊號考略>,頁9~13,全文被人大複印 資料《宋遼金元史》,頁49~56。

¹⁴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英藏黑水城文獻》(3~4冊),2005年。

31、32、33(有複本)、34、35(有複本)、37(有複本)、39、40、41、42、43、44、45(有複本)、46、48(有複本)、51(有複本)、53、54、57、59、60、61、62、63、64、65(有複本)、66(有複本)、67(有複本)、68、69(有複本)、70(有複本)、71(有2個複本)、72、73、74、75、79、80(有複本),共53卷,其中有十三卷有複本存在,系唐於闐三藏實叉難陀譯本,因卷數較多,沒有列出編號。15

靈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還有寧夏博物館卷第 76 (N11·004[03941]);羅雪樵藏卷第 26 (N31·001)、57 (N31·002)。¹⁶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靈武出土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74(B51·001)。¹⁷ 敦煌莫高北區第53 窟發現西夏文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2 (G11·040[B53:10 正])封面、西夏文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4 (G11·041[D.752-61]),藏敦煌研究院。¹⁸甘肅省博物館藏刻本-經折裝《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35(G21·056[T27])、甘肅省定西文化館藏泥金字寫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15(G21·078[7·21])。¹⁹甘肅張思溫個人收藏靈武出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11~15。²⁰

2.中國藏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主要有:內蒙古藏《大方廣佛華嚴經》 (F14:W13)「光明覺品第九」,²¹有「大夏圓寂寺」、「賀家新施經」内容。²²《大方廣佛華嚴經》(M1·1385【F13:6】)²³、《大方廣佛華嚴經》(M1·1415 【F20:W4】)之「十無盡藏品第二十二」。²⁴《大方廣佛華嚴經》(M1·1417

^{15 1917}年在靈武出土了不少佛經,大部分入藏國家圖書館,還有一部分藏于寧夏、甘肅和流失日本。其中寧夏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第26、57、76卷。甘肅的張思溫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第11、12、13、14、15卷。另外西安藏刻本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第9卷。甘肅定西縣文化館藏八面泥金字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等。

¹⁶ 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3冊),頁14、313~373。

¹⁷ 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2冊),頁369~401。

¹⁸ 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6冊),頁149~150。

¹⁹ 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6冊),頁353~354、380。

²⁰ 石宗源主編,《張思溫文集》,頁374~376。

²¹ 李逸友編著,《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頁223。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頁287,《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僅收錄這一個編號的殘經,編號為(M21·224[F14:W13])。其殘葉內容應為實叉難陀譯八十《大方廣佛華嚴經》。

²² 李逸友編著,《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頁223。

²³ 塔拉等主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8冊),頁1718。根據 殘經內容,可以確定其為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 八》「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九」的內容。

²⁴ 塔拉等主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8冊),頁1737。

【F20:W68】)之「十無 25 盡藏品第二十二」。 26 陝西西安市文物局藏漢文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 9 (S21·006[2gz59]) 結尾處,但左面有 4 行西夏文題記。 27

(四)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

據學者考證,日本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也出自靈武,存刻本卷第 1、2、3、4、5、6、7、8、9、10、36 和寫本第 74 卷等。²⁸

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一)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漢文

1.俄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第 92~96 號,西夏特藏 350 號,共 11 個館冊號)有刻本-蝴蝶裝,第 92~95 號,9 個館冊號。刻本-經折裝,第 96 號,2 個館冊號。從佛經題記看,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是由秉常尊號(德成國主福盛民正大明皇帝嵬名)及其母尊號(天生全能番祿祐聖國正皇太后梁氏)或秉常尊號(德成國主福盛民正大明皇帝嵬名)及其母尊號(天生全能番祿法式國正皇太后梁氏)禦譯的,仁孝禦校。

2.俄藏漢文《普賢行願品》為刻本-經折裝,皆為般若譯本,分甲、乙、丙、丁、戊等版本,共有 24 個編號,7 個版本,即天盛十三年(1161 年)版(2 個單行印本)、乾祐二十年(1189)版(13 個單印本)、天慶三年(1196)(5 個單印本)以及大安十一年(1085)版、12 世紀上半期版和 12 世紀中期的版本(各有 1 個單印本)。²⁹還有一些未標明版本的《普賢行願品》(TK-63A、TK-72、73、147、258、инв.№951等)。這甲、乙、丙、丁、戊等版本《普賢行願品》皆有「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並定譯」,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二)中國藏西夏文、漢文

1.中國藏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有:甘肅省博物館藏西夏文刻本《大方廣 佛華嚴經》卷第 40(G21·036[13221])³⁰、《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²⁵ M1·1415【F20:W4】和M1·1417【F20:W68】品題中「十天盡藏品」中的「天」應為「無」,為「十無盡藏品第二十二」,為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二十一卷。

²⁶ 塔拉等主編,《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8冊),頁1737。

²⁷ 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5冊),頁361。

²⁸⁽日)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1~2冊),1975~1976年。

²⁹⁽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漢文遺書敘錄》,頁5。

³⁰ 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6冊),頁294。這個殘葉內容其實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的

 $(G21.055[10705]) \circ ^{31}$

2.中國漢文《普賢行願品》有:《普賢行願品》(F9:W20)。32

(三)英藏西夏文

《英藏黑水城文獻》中西夏文《普賢行願品》有:or.12380-3084aR (K.K.II.0232.cc)、or.12380-3084bRV(K.K.II.0232.cc)、or.12380-2964 (K.K.II.0240.bb)、Or.12380-2968RV(K.K.)、Or.12380-2967(K.K.II.0243.q)、Or.12380-3203RV(K.K.II.0295.s)、Or.12380-3204RV(K.K.II.0295.s)、Or.12380-3213RV(K.K.)、Or.12380-3215RV(K.K.0288.a.xi)、Or.12380-3484 (K.K.II.0243.t)、Or.12380-3501(K.K.II.0258.d)、Or.12380-2244(K.K.II.0266.d)、Or.12380-2758(K.K.II.0297.r)、Or.12380-2961(K.K.II.0290.b)、Or.12380-3483(K.K.)、Or.12380-0257(K.K.II.0284.mm)、Or.12380-0254(K.K.II.0284.jj)(右面)、Or.12380-0224RV(K.K.)、Or.12380-0058(K.K.II.0283.ooo)等。

三、華嚴注疏

(一)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漢文注疏

1.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有:寫本-卷子裝《大方廣佛華嚴經注由義釋補》(第491號,西夏特藏349號,館冊7211號)。³³刻本-蝴蝶裝《華嚴金獅子章》(華嚴宗法藏撰著)(第304號,西夏特藏323號,館冊739號)。寫本-卷子裝《華嚴法界觀幹》(第305號,西夏特藏324號,館冊5656號)。寫本-小冊子《注華嚴法界觀門深》(第306號,西夏特藏395號,館冊942號)。

2.俄藏漢文注疏有:《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刻本-經折裝,TK-114)、《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上、下,宗密注,TK-241、242)、俄藏漢文《普賢行願品》皆有「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並定譯」,下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

通過上文梳理,在黑水城、靈武、武威、敦煌等地出土《大方廣佛華嚴經》 主要是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般若譯四十卷本、四十《華嚴經》最後一品「入 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及澄觀、法藏等對《華嚴經》所作的注疏等,為

內容。

³¹ 史金波等編,《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6冊),頁321~352。

³² 李逸友編著,《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頁223。

³³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521.孫伯君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的西夏文照片,將其定為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13和遼代鮮演大師《華嚴經玄談抉擇記》卷4兩部分內容。

研究華嚴經典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 ,

西夏故地出土佛教文獻中《華嚴經》占相當份量。佛經種類有寫本、刻本和泥金字寫經等,裝幀形式有寫本-卷子裝、寫本-經折裝、寫本-小冊子、寫本-貝葉裝、刻本-經折裝、刻本-蝴蝶裝、刻本-卷軸裝等。這些材料足以證明西夏時期華嚴經典流行十分廣泛。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蒙元時期,蒙元時期依然多次印製西夏文和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懺儀》等,滿足廣大信眾的需求。

有關蒙元統治者印製西夏文佛經的記載較多。夏乾定四年(1227)隨著西夏亡於蒙古,西夏遺民或留居故地,或簽發為軍隊隨蒙古軍隊到各地作戰,於是西夏遺民散居各地。目前,在河南、河北、安徽、浙江、福建、西藏等處都有西夏遺民活動的記載。西夏遺民散居各地後仍然保持本原來的宗教信仰和使用西夏文字,對佛經需求量仍然很大。蒙元統治者為了穩定西夏遺民的情緒,滿足信眾的誦經和供養流通經典的需要,在西夏滅亡二十餘年後就開始刊印西夏文佛經,散施於西夏故地和一些寺院。國家圖書館藏《金光明最勝王經》卷末發願文記載:

今釋迦已滅,付法傳而至於今時,佛法住盛榮者,以此經是。故大界國世界信眾施主陳慧高,念此語故,發出大願,番國舊印板國毀中失,因此施捨淨物,令雕新字,乙巳年八月十五日始起,丁未年中刻畢,淨紙上得以印施。

史金波先生曾對國圖藏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文進行翻譯,考證此經是在蒙古國太宗窩闊台死後的乃馬真稱制之時始雕,刊畢于定宗貴由二年,即 1242~1247 年間版本。³⁴

《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紀》記載:「罷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經板。」³⁵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其孫鐵木耳即位,是為成宗,成宗即位之初就罷停河西藏經板,足以說明在忽必烈時期存在雕刻河西字大藏經的行為,由宣政院具體負責。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記載了有關元代刊刻佛經的內容,依據西夏文重新翻譯如下:

³⁴ 史金波, <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跋考>, 頁45~53。

^{3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8<成宗本紀>(一),頁389。

......後奉護城帝³⁶敕,與南北經重校,令國土盛。慧提照世,法兩普潤 天下,大夏為池,諸藏潮毀全無。皇初界朝,中界寂澄,上師結合勝 弱,修造一藏舊經。至元七年,化身一行國師,生廣佛事,具令校有譯 無,如度意寶,印製三藏新經。後我世祖皇帝,恩德滿貫天下,令國土 通。高道勝比萬古,四海平安。八方由旬時經,深信三寶。因欲重舉法 幢,法事慧寶,深窮禪法密律,志多長意。上聖願滿求緣,清(淨)源、 鮮卑吃靼尚等,可以至使無悟德音,聖旨已出,江南杭州實板應終已 成,以主事僧鮮卑土清(淨)詔行,.....先後二十多人,至元三十(1293) 萬壽寺中印刻所需千種,施財超萬秩等。成宗帝朝,大德六年(1302) 夏初大凡完畢,依詔施印十藏。武宗皇帝聖威神功無比,僧尼大居法 門,殊匿治知金輪。今帝爾時東宮隱龍,起廣大願,已施印五十藏。如 今皇帝(仁宗皇帝),一得至尊至聖,勝南面中上萬乘諸主,文武奇出, 深悟明曉佛法才行,大吉功德,皆如高大,帝道日新,佛事無有繼斷, 受以七寶,四海如子,治知十善,依行八方,習德欲緣,依詔重印五十 藏應已成。知院淨德法處大臣心重,敕受使令二師知總勾管,至大四年 (1311)七月十一開始,皇慶初年(1312)八月望日印畢,知院中治二 使依表自進雜校缺譯經,聖二名新正顛倒而於合,短窄廣平,縛牌莊 懸,種事多已正知。依敕普施萬代法眼不絕,讀誦供養千劫善緣常求, 悶迷言悟,最上佛種,守護聖德多言。以是善典,唯願:今如皇帝聖壽 萬歲,願降聖皇太后賢壽當為無盡,宮正皇后與天壽長同等......時大元 國皇慶元年(1312)歲次 壬子秋 中望日......

這一發願文既反映了西夏時期佛教興盛,譯校佛經的盛況,也列舉出蒙元 統治者曾多次修造和刊印河西字大藏經,主要有:其一,皇初界朝,中界寂 澄,上師結合勝弱,修造一藏舊經。其二,至元七年(1270)開始,統治者令 搜集西夏舊版,由一行慧覺負責刊印。其三,在至元三十年(1293)在杭州萬 壽寺經板已刻完,根據需要刊印河西字大藏經千餘種。其四,成宗大德六年 (1302)夏初,依詔施印十藏。其五,武宗皇帝施印五十藏。其六,仁宗皇慶 初年(1312)八月望日印五十藏。

蒙元曾先後六次修造和刊印河西字大藏經,前兩次應該在修造西夏舊版或 在舊版基礎上重新翻譯缺失的經文,及至至元三十年(1293)萬壽寺經板雕刻 完畢,後幾次刊印的河西字大藏經應是依據杭州路萬壽寺雕版進行刊印的。

《華嚴經》、《涅槃經》、《寶積經》和《般若經》作為四大部經,他們 是歷來需求量最多的經典之一,在蒙元刊刻河西字大藏經也自然要刊刻的。

^{36 「}護城帝」即是指仁孝。

《磧砂藏》影印本「遵」字函《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末題記(按照經題結 尾處格式錄文,並添加標點符號)記載了管主八負責刊印佛經事業,所印河西 字大藏經包括《華嚴經》及其經懺:

上師三寶加持之德

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余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定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再發心於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余卷,施財三百定,仍募緣于杭州路,刊雕完備,續補天下藏經,悉令圓滿。集于功德回向西方導師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海眾菩薩。祝延皇帝萬歲,太子、諸王福壽千春,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大德十年丙午臘八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 管主八謹題。37

《 磧砂藏 》影印本「何」字函《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卷末題記 (按照經題 結尾處格式錄文 , 並添加標點符號) 也有類似記載:

上師三寶加持之德

皇帝太子福蔭之恩,管主八累年發心,印施漢本、河西字大藏經八十余藏,《華嚴》諸經懺、佛圖等、西蕃字三十餘件經文外,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施中統鈔貳佰錠及募緣雕刊,未及一年,已滿千有餘卷。再發心,於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經律論數百余卷,施財三百定,仍募緣于杭州路,刊雕完備,續補天下藏經,悉令圓滿。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印施人天。回向西方導師阿彌陀佛,觀音、勢至、海眾菩薩。祝延

皇帝萬歲,太子、諸王福壽千春,佛日增輝,法輪常轉者。 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宣授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謹題。³⁸

日本善福寺、中國國家圖書館和山西崇善寺都藏有元管主八負責刊印《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之題記大同而小異。其中山西崇善寺藏「踐」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末記載:

上師三寶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諸王覆護之恩,管主八誓報四恩,流通正教,累年發心,印施漢本大藏經三十余藏,³⁹四大部經三十

^{37《}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影印宋磧砂藏經》,冊586,頁91。

^{38《}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冊585,頁74。

餘部,《華嚴》大經一千餘部,經、律、論、疏鈔三百餘部,⁴⁰《華嚴 道場懺儀》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三千余部,梁皇寶懺、藏經目錄、 諸雜經典不計其數。金銀字書寫《大華嚴經》、《法華》等經共計百卷。 莊嚴佛像,金彩供儀,刊施佛像、圖本,齋供十萬餘僧,開建傳法講 席,日逐自誦《大華嚴經》一百部。心願未周,欽睹聖旨,於江南浙西 道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華嚴諸經 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 30 余藏,及《華嚴》大 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 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⁴¹

這幾則由管主八負責刊刻河西字大藏經題記足以證明《華嚴經》在當時極為受到重視,管主八不僅刊印《華嚴經》及懺儀,而且還「開建傳法講席,日逐自誦《大華嚴經》一百部」,並在河西字藏經刊印完畢之後,散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在靈武等地發現大量元代刊印的西夏文《華嚴經》等正好可與之相互印證。

除了管主八主持印刷西夏文《華嚴經》外,由西夏遺民李慧月⁴²等人刊印漢文《華嚴經》,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藏漢文《華嚴經》卷九末有西夏文木押捺印四行,史金波翻譯內容:「番國賀蘭山佛祖院攝禪園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禪師之弟子為報福恩,印刷十二部大藏契經及五十四部《華嚴》,又抄寫金銀字之《華嚴》一部、《金覺》、《蓮花》、《般若》、《菩薩戒》契經、《起信論》等」。⁴³

從這記載可知,李慧月在蒙元時期也刊印過漢文及抄寫金銀字《華嚴經》, 其版式亦為每折頁 6 行,行 17 字,與《磧砂藏》、《普寧藏》版式相同,這種 裝幀方式是繼承宋《崇寧藏》的版式,《崇寧藏》一改《開寶藏》和《契丹藏》 的卷軸裝為經折裝,每版刻經文 36 行,行 17 字版式。這種裝幀版式一直為 元、明清以來刻本大藏經所沿用。因為殘經過於殘缺,其刊印地點不得而知,

³⁹ 日本善福寺藏本作「五十余藏」。

⁴⁰ 日本善福寺藏本作「五百余藏」。

⁴¹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291~292。

⁴² 在《西夏佛教史略》(頁99)中,史金波認為李慧月為西夏文,西夏時期在賀蘭山佛祖院曾雕刊了全部漢文大藏經經板,並至少印製過十二部漢文大藏經,賀蘭山佛祖院是西夏的一座重要寺院。李際寧在《關於<西夏刊本漢文版大藏經>》(《佛教大藏經論稿》,頁196-197)一文中則根據《磧砂藏》、《普寧藏》和原守屋孝藏氏收集品中四件罕見元代泥金寫本等內容考證李慧月是西夏遺民,隴西人,俗姓李,名立義,法名慧月,法號光明禪師,主要生活在元代初年,他先遊歷塞北,後到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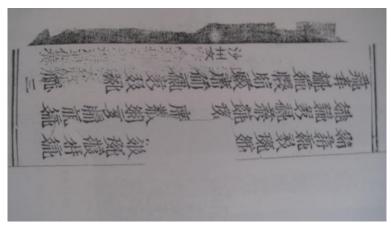
⁴³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頁98~99。

估計應與管主八刊印佛經的地點基本一致。

開元、臥龍存「分」字函《阿毗曇毗婆沙論》卷四有二印章:一個是長方 形陽文墨印,文曰:「河西李立義光明禪師惠月,舍體已財,印造一十二大藏 經,散施諸方,普願見聞,生生見佛、世世聞經者,謹記。」另一是長方陽文 朱印,文曰:「李□一光明禪師。」□□應為西夏文,可能為墨印中「立義」二字, 可惜,影印本中沒有保留二印章。44李富華推測《阿毗曇毗婆沙論》卷四為《普 寧藏》,但為什麼《普寧藏》本佛經還會出現西夏文?

西夏遺民多次負責刊印《華嚴經》,充分說明西夏對其需求量之大。蒙元統治者幾次刊印河西字佛經,既有蒙元收集西夏舊版,校有譯無後而刊印版本;也有杭州萬壽寺新雕版本,河西字大藏經存在多個版本的情況。目前出土的佛經也完全證明這一點,河西字大藏經印製完畢,「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這在出土文獻中也得到證實。敦煌莫高窟北區第 159 窟出土佛經刻本《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經末有一長方形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45 (圖 1)

《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內容為《大智度本母》(卷第 87)(圖 2)尾題前有漢文壓捺印記,內容為「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于沙州文殊師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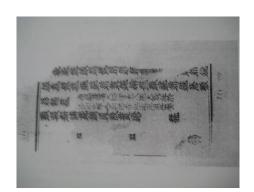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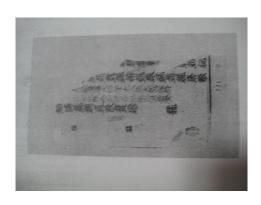
(圖1) 莫高窟北區第159窟《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

⁴⁴ 楊繩信,<論「磧砂藏」>,頁49~54。

^{45《}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頁148。

^{46《}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 頁99~100。





(圖 2) 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0 、Pelliot Xixia 924(Grotte 181)112 《大智度論》

此外,在山西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西夏文內容翻譯為「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圖 3),殘葉上方有收藏者標注「西夏文經首殘片,為西夏國王李元昊與野利仁榮所創,元大德年間松江府杭州路大萬壽寺雕刻之一,非常貴重」內容。

元代刊印佛經不僅被散施到西北諸多寺院,而且在山西崇善寺也有收藏, 管主八刊印河西字大藏經也散施到其他有西夏遺民居住的地方,供西夏遺民誦 讀供養和流通。



(圖3)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殘片

從上述圖 1、圖 2 內容可以知道,管主八負責刊印的莫高窟北區第 159 窟《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殘存偈語,不好判斷字數,有帙號「語」或「言」,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收錄《大智度本母》則為行 17 字與《磧砂藏》版式相同,其帙號為「做」或「辦」,又與《磧砂藏》中同部佛教帙號不同。

《磧砂藏》影印本「何」字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卷末題記提及「新刊《大華嚴經》板八十一卷」這一情況需要注意,八十卷《華嚴經》本來十卷一函共八函八十卷,此處提到八十一卷多出一卷。學者考證,崇善寺藏本《大華嚴經》末函即「臣」字函中還有元延祐六年(1319)刊本的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一卷,在元代管主八負責刊印的大藏經中已經將《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一卷加入《大華嚴經》之中,故成八十一卷。⁴⁷《普賢行願品》一部一卷添入《大華嚴經》末函在元大德三年(1299)「普寧藏目錄」之中已有著錄,可知,元代刊印漢文《華嚴經》的帙號基本遵循沿用前代漢文《大藏經》帙號。

靈武出土國圖藏元印製西夏文《華嚴經》的版式為每折頁 6 行,行 17 字,上下雙欄,實叉難陀漢譯,仁孝皇帝「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制義去邪醇睦懿恭皇帝禦譯」,其版式與《磧砂藏》、《普寧藏》版式是一致的,但帙號卻不相同。國圖藏西夏文《華嚴經》每十卷一個帙號,卷 11~20 為「資」、卷 21~30 為「產」、卷 31~40 為「鐵」、卷 41~50 為「生」、卷 51~60 為「東、尾」、卷 61~70 為「江、河」、卷 71~80 為「山、月」。國圖藏《華嚴經》缺卷第 1-10,而日本藏《華嚴經》則有卷第 1~10 內容,其版式與國家圖書館一致,卷 1~10 帙號為「解、悟、明、達」,卷第 36 為「鐵」。⁴⁸這樣元代印刷的西夏文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帙號是:「解、資、產、鐵、生、東、江、山」,說明元代印西夏文《華嚴經》是入藏經典,但這一套帙號卻與漢文大藏經不同,那麼元印製西夏文《華嚴經》的帙號不可能是元代另創一套,應該繼續沿用西夏文佛經帙號。

目前「解、資、產、鐵、生、東、江、山」這八個表示帙號的字的出處不 得而知,表示意義應與黨項人對山川、地理、環境和礦產資源的認識有著某種 關係。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教文獻中收錄《華嚴經》也有帙號,克恰諾夫認為,俄藏西夏文《華嚴經》有兩套帙號,⁴⁹其中有一套帙號與元代印《華嚴經》的帙號使用文字大多相同,僅卷第 1~10 的帙號、卷第 11~20 帙號、卷第 31~40 帙號的三個字有差異,不知何故?⁵⁰只有等待俄藏黑水城《華嚴經》圖版出版之後,在進行核對。

⁴⁷ 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頁290。

^{48 (}日)西田龍熊,《西夏文華嚴經》(1~2冊),页1、29、67、105、147、181、225、267、269、305、343、373、375、403。

⁴⁹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стр 690

⁵⁰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стр. 690.

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除用「解、資、產、鐵、生、東、江、山」八個字表示帙號外,在克恰諾夫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經文獻敘錄》中還提到另一套帙號即用「大、方、廣、佛、華、嚴、經、典」標題八個字表示八十卷經文。⁵¹

英藏黑水城西夏文《華嚴經》雖然過於殘缺,但其版式與元印製西夏文佛經的字體、版式完全不同,可以確定英藏黑水城文獻殘經應該是在西夏時期刊印或抄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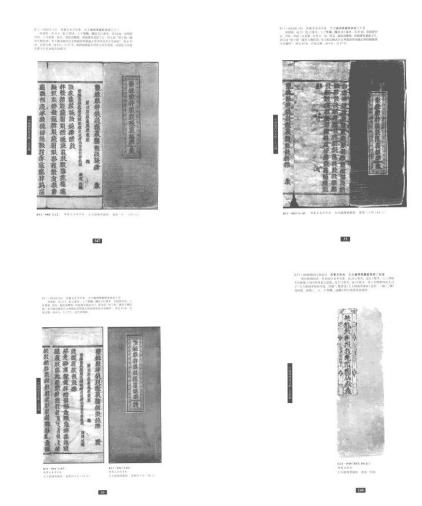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華嚴經》尚未刊佈,我們僅能根據克恰諾夫敘錄所列各個版本每行14字、13字、15字、經末題記「人慶二年(1145)」和西夏抄經者人名等線索綜合分析判斷,西夏在翻譯完成西夏文之後,應該刊印過《華嚴經》。然而克恰諾夫在敘錄中僅僅提到某卷有帙號,並沒有給出表示帙號之西夏字。儘管如此,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實叉難陀漢譯本傳到西夏境內,最晚在秉常時期已把此經翻譯成西夏文,西夏人仿照漢人刊印大藏經使用帙號的做法也採用帙號,但不是使用漢文佛經用「千字文」和藏族佛經用贊文表示帙號的習慣,西夏文佛經而是另有一套自己標識帙號的體系,元刊西夏文八十卷《華嚴經》帙号「解、資、產、鐵、生、東、江、山」與元刊漢文本《普寧藏》和《磧砂藏》中《華嚴經》的帙號為「拱、平、章、愛、育、黎、首、臣」八個字不同。可以說西夏文佛經帙號到元代刊印河西字大藏經時期繼續使用。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需要交代一下,史金波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西夏文文獻初探》52中提到在北區 B53 出土(編號 B53:1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鐵」,53並論及在國圖藏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 31~40 的函號為「鐵」,二者不同。其實史先生忽略了一個問題,我們把敦煌北區出土西夏文《華嚴經》封面與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華嚴經》封面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西夏文《華嚴經》封面的標號與經文中的標號存在一定差別,封面一般只標每卷最後一個數,而經文中則要標注全部卷數,例如,如果這卷經是三十二卷,那麼在封面上只標第二卷,經文中則要標注卷第三十二,可以參見下面幾個圖片,西夏文《華嚴經》帙號和卷數的標注便十分明瞭。

⁵¹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стр. 690.

⁵² 史金波, <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西夏文文獻初探>, 頁1~16。

^{53 《}中國藏西夏文獻》(第16冊)(頁149)延續史先生觀點,依然把 莫高窟北區出土《華嚴經》的封面直接定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第二「鐵」。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敦煌莫高窟出土西夏文《華嚴經》非卷第二「鐵」,應該是《華嚴經》卷第三十二「鐵」,史先生的判斷有誤。敦煌出土西夏文《華嚴經》的帙號與國家圖書館藏靈武出土的帙號是一致的,但仔細比對敦煌莫高窟北區《華嚴經》卷三十二封面與國家圖書館的封面還是存在一定差別,可以斷定,在靈武與敦煌出土的西夏文《華嚴經》是具有相同帙號的不同版本。

根據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有「民安(1090~1097)初年,五十三年國內先後大小三乘、半滿法皆有昌傳,已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後護城帝詔,依南北經重校,使國內茂盛,慧提照世,法雨普潤天下」54的記載,再結合文獻記載、佛經題記和出土佛經版式,我們可以確定,西夏文和漢文《華嚴經》刊刻、抄寫的時間不一,有西夏時期刊刻、抄寫完成的,也有元朝刊刻的,具體情況只有等到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教文獻刊佈之後再做深入探討。

⁵⁴ 崔紅芬,《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再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主辦第二屆東亞佛教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

 \equiv ,

管主八負責雕刊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河西字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在大德六年(1302)已經完成,並欽此勝緣,在大德六年管主八刊刻河西字大藏經三十余藏,此外,還刊印西夏文《華嚴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及《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散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元代刊印河西字和漢文大藏經大量施於西北諸多地區,也說明這一地區佛經興盛和華嚴經典流行。

從佛教在中國發展歷程看,西北地方有著良好的《華嚴經》翻譯和傳承基 礎。尤其早期翻譯過來的華嚴經典很多是由西北僧人在西北地方完成的,最早 可以追溯到漢代。其中有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兜沙經》、即「華嚴經名號品」), 西晉聶道真譯《諸菩薩求佛本業經》(「淨行品」)、《十住經》(「十地品」)、 《菩薩十法住經》、《大方廣佛菩薩十地經》、《菩薩本願行品經》(亦「淨行 品」)、《菩薩十道地經》(似「十住品」)、《菩薩初地經》(似「初地」),竺 法護譯《菩薩十住經》(「十住品」)、《菩薩十地經》(似「十地品」似「十住 品」)、《菩薩十住行道品》、《漸備一切智德經》、《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 (一名《普賢菩薩定意》)(「十定品」)、《佛說如來興顯經》(「性起品」無重 頌偈)、《度世品經》(「離世間品」),鳩摩羅什譯《十住經》(「十地品」)、 《佛說莊嚴菩提心經》、《十住毗婆沙論》,西秦聖堅(法堅)譯《佛說羅摩 伽經》,姚秦涼州竺佛念譯《十地斷經》(「十地品」),西晉白法祖譯《如來興 現經》等,這這些經典譯出為以後六十卷《華嚴經》、八十卷《華嚴經》、四 十《華嚴經》流行以及華嚴宗派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西北地方信仰華嚴 的傳統一直持續到夏元時期,西夏時期將《華嚴經》及其注疏譯成西夏文在境 内流行,並由西夏遺民慧覺完成《華嚴懺儀》的集錄。

筆者對《華嚴懺儀》的集錄有所考證並撰寫文章,我們知道《華嚴懺儀》 最晚在大德六年(1302 年)前已由西夏遺民慧覺輯錄完成,大德六年雕板完 備,到大德十一年(1306)左右已刊畢散施西夏故地,在河西等地流行。《華 嚴懺儀》在元代刊印流行後,又經蒼山載光寺沙門普瑞添加注釋,重新刻印, 到明代正式收錄到《嘉興藏》及後來《卍續藏》中。《華嚴懺儀》卷 42 末除 列舉印度、東土傳譯華嚴經諸師外,還談到「大夏國弘揚華嚴諸師」師承,進 一步證明了西夏時期不僅流行《華嚴經》及其注疏,而且在還形成華嚴信仰師 承。

《華嚴懺儀》卷 42 列傳承華嚴諸師如下:

「初西域流傳華嚴諸師」

「次東土正傳華嚴祖師」

.

南無依大方廣佛華嚴經造大不思議論一切智者龍樹大師菩薩 南無依大方廣佛華嚴經造十地論六祖圓融千部論主天親菩薩 「次東土傳譯華嚴經諸師」

南無晉朝北印土佛馱跋陀羅覺賢三藏法師 南無唐朝中印土地婆訶羅日照三藏法師 南無證聖於闐實叉難陀喜學三藏法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第三祖造法界觀帝心法順法師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第四祖造十玄門雲華智儼法師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第五祖造探玄記賢首法藏法師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第六祖造大疏鈔清涼澄觀法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清涼門下得如來知見者三十八大師等千余法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第七祖造華嚴綸貫注觀文圭峰宗密禪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造觀注記者廣智大師

「次大夏國弘揚華嚴諸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講經律論重譯諸經正趣淨戒鮮卑真義國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傳譯經者救脫三藏魯布智雲國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令觀門增盛者真國妙覺寂照帝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流行印造大疏鈔者新圓真證帝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開演疏鈔久遠流傳臥利華嚴國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傳譯開演自在命咩海印國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開演流行智辯無礙頗尊者覺國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西域東土依大方廣佛華嚴經十種法行勸贊隨喜一切法師;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中蘭山雲岩慈恩寺流通懺法護國一行慧覺法師。55

慧覺所列西夏傳承華嚴的僧人不亞于中土其他時期傳承華嚴僧人。囿於材料,所列西夏傳承華嚴的帝師和國師目前尚無法全部考證,但如此多的西夏國師、帝師參與重譯、弘傳、開演《華嚴經》及中土華嚴諸師的著作,則充分說明西夏時期華嚴信仰的興盛,也體現西夏對華嚴經論的重視。

^{55《}華嚴懺儀》,《卍續藏》冊128《禮懺部》,頁710-711。

《華嚴懺儀》題記提到西夏國弘揚華嚴諸師中「鮮卑⁵⁶真義國師」居第一位。真義國師的活動主要在河西地區,他的畫像出現在榆林第 29 窟內室西壁門南側西夏供養人畫像之前,有榜題曰:

(第一身) 真義國師信畢智海。

(第二身)□□□沙州監軍攝受趙麻玉一心皈依。

(第三身)□內宿禦史司正統軍使趣趙一心皈依。

(第四身)□兒子禦宿軍訛玉一心皈依。

(第三身與第四身之間紙貼小孩) 孫沒力玉一心皈依。

第 29 窟是一個典型的家窟,由西夏官員趙麻玉等人主持開鑿的。自歸義 軍政權開始,一些有權勢的家族紛紛開窟造像,延請僧人作為導引已成為一種 潮流。西夏初期繼續這一傳統,在第 29 窟供養人之前繪國師像,可見鮮卑真 義國師在河西地區有一定威望,與趙氏家族關係非同一般。

居第二位的是「魯布智雲國師」,國圖藏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前木刻板畫「西夏譯經圖」榜題中有他的名字。譯經圖中共刻僧、俗人物二十五身,有西夏文題款十二條,標明圖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名字。譯經圖上部橫刻一條題款為「都譯勾管作者安全國師白智光」。智光左右兩側各有僧俗四人,僧前俗後,共十六人,榜題為「相佑助譯者,僧俗十六人」,八位僧人是:北卻慧月、趙法光、嵬名廣願、昊法明、曹廣智、田善尊、西玉智園、魯布智雲。據考「西夏譯經圖」描繪的是秉常時期譯經的盛況,安全國師白智光當屬秉常時期一位僧人。

白智光還出現在國圖藏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中:「……又千七年漢國壬申歲⁵⁷(1032)中,夏國風帝起法禮德立新。戊寅(1038~1048)年中國師白法信及後奲都(1057~1062)年⁵⁸臣智光等先後三十二人為首,依令番譯。」⁵⁹其中奲都(1057~1062)年,是諒祚的一個年號。可見,智光國師等在諒祚時已開始翻譯佛經,至少經歷諒祚和秉常兩朝。魯布智雲與白智光一起譯經,說明他們為同時期的僧人。那麼排在魯布智雲前的鮮卑真義國師生活年代就應更早些,即在諒祚朝或元昊時期。因此,在西夏初期《華嚴經》已被翻譯成西夏文,鮮卑真義國師和魯布智雲國師都參與此事。

⁵⁶ 信畢即鮮卑、西壁。

⁵⁷ 聶鴻音,<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中的兩個年號>, 頁11~12。

⁵⁸ 聶鴻音, <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中的兩個年號>, 頁11~12。

⁵⁹ 崔紅芬,《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再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主辦第二屆東亞佛教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

及至真國妙覺寂照帝師令《觀門》增盛,《觀門》應指法順《華嚴法界觀門》,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經文獻敘錄》中西夏特藏 393 號,館冊第 6904 號《淨土求生順要論》提到一位「明照或寂照國師傳」,這是唯一一點與寂照有關的內容,俄藏文獻中的寂照是不是《華嚴懺儀》中提到的寂照帝師尚需繼續考證。

新圓真證帝師應該是傳承、刊印並使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流行的高僧。臥利華嚴國師進一步開演《疏鈔》並使之久遠流傳。

華嚴師承傳到「開演流行智辯無礙頗尊者覺國師」時,已是西夏晚期,之後列舉「西域、東土依大方廣佛華嚴經十種法行勸贊隨喜一切法師」,可以理解為西夏時華嚴諸師傳承到此結束。但隨後出現「蘭山雲岩慈恩寺流通懺法護國一行慧覺法師」,慧覺能如此詳細列舉西夏時期傳承華嚴諸師,如果他不是西夏遺民,不在西夏故地生活出家多年,是很難做到這一點。

筆者結合佛經題記和洛陽白馬寺出土的《故釋源宗主宗密圓融大師塔銘》60 對慧覺進行詳細考證。慧覺(?~1313 年)涼州人,俗姓楊,西夏高官的後 代,精通顯宗和密宗,融會華嚴圓融之旨,一生致力於弘揚佛法,其活動大致 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大約在蒙古國時出家為僧,修道於賀蘭山雲岩慈恩 寺,法名慧覺,主修密宗和禪觀,為西夏遺民重刻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 作序等。第二,慧覺來到洛陽,從龍川修習華嚴,對法性圓融的理解已達到極 高的境界。後留居白馬寺,協助龍川修葺釋源,並隨大師去大都從事校經,被 授「宗密圓融大師」號。第三,慧覺受永昌王延請和奉太后詔,多次到涼州等 地進行佛事活動,弘法建寺,教化民眾。在此期間,慧覺出任河南僧錄和洛陽 白馬寺第三任釋源宗主,輯錄《華嚴懺儀》。慧覺的活動為蒙元時期佛教傳播 和白馬寺的興盛起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西北和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在 當時享有較高的聲望。61

慧覺輯錄《華嚴懺儀》並能列舉詳細傳承華嚴諸位國師和帝師,這正體現 慧覺是西夏遺民,並以自己是西夏人為榮。師龍川研習華嚴,到輯錄《華嚴懺 儀》時,慧覺已是佛學大師,故輯錄《華嚴懺儀》時把自己列入西夏弘傳華嚴 師承之後,以示對故土的懷念,並體現了他作為西夏遺民的榮耀。

在西夏境內不僅《華嚴經》及其《普賢行願品》流行,而且華嚴祖師的著述也傳到西夏,在黑水城西夏文藏品中還有宗密禪師《禪源諸詮集都序》、《禪源諸詮集都序綱文》、《南裴休禪師隨緣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⁶⁰ 洛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洛陽市志》,卷15「白馬寺·龍門石窟志」,《故釋源宗主宗密圓融大師塔銘》,頁100~102。

⁶¹ 崔紅芬,<僧人慧覺考略>,《世界宗教研究》,頁47~57。

和《華嚴法界觀幹》⁶²,法藏《還源觀》、《華嚴金師子章》⁶³和《注華嚴法界 觀門深》等得到西夏僧人的翻譯、開演、印造和護持傳承,使得《華嚴經》信 仰得到發揚。

《注華嚴法界觀門深》(西夏特藏第 395 號,館冊第 942 號)結尾處提到「妙悅寺沙門慧海」⁶⁴,在西夏文獻中河西僧人有個周慧海,《聖勝慧彼岸到功德寶頌曰》(西夏特藏 66 號,館冊 598 號)題記載:「賢覺帝師、講經律論者、功德司正、賜具足沙門波羅顯勝證義;天竺密宗五明國師、講經律論者、功德司正、賜安寧沙門拶耶阿難答執梵證義;顯密法師、功德司副……沙門周慧海譯西夏文」。⁶⁵

《如來一切之百字要論》(西夏特藏 195 號,館冊 7165 號)題記稱:「賢 覺帝師、天竺五明大缽陀編寫集傳;解義法師義幹譯自梵文;顯密法師、功德 司副周譯西夏文」。⁶⁶

雲居寺藏《藏漢合壁「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題記也提到周慧海,內容為:「詮教法師、番漢三學院並偏袒提點、囔美則沙門鮮卑寶源漢譯;顯密法師、功德司副使、囔臥英沙門[周慧海];演義法師、路贊訛、囔賞則沙門遏啊難捺吃哩底梵譯;天竺大缽彌怛、五明顯密國師、講經律論、功德司正、囔乃將沙門拶也阿難答親執梵本證義;賢覺帝師、講經律論、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點、囔臥勒沙門波羅顯勝;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再詳勘」。67

仁孝皇帝帶「制義去邪」的尊號是在大慶二年(1141)以後開始使用的。 武威天梯山石窟中發現《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下卷),題記有:.....沙 門長耶阿衲捺(筆者按:拶也阿難答)傳,顯密法師、功德司副、受利益沙門 周慧海奉敕譯。並有「奉天顯道耀武宣文聖智惇睦懿恭皇帝」尊號。陳炳應先 生考證這是仁孝皇帝在1139~1140年間使用的尊號。⁶⁸題記中提到周慧海的封 號與職銜為「顯密法師、功德司副、受利益沙門」和「囔臥英沙門[周慧海]」,

⁶²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cтp.465 , 577 , 584 , 614 , 454.

⁶³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стр.453 ~ 454.

⁶⁴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стр. 455.

⁶⁵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482 ~ 483.

⁶⁶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448 \sim 449$.

⁶⁷ 羅炤,〈藏漢合壁「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考略〉,頁4~36。

⁶⁸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頁56。

我們現在還不確知「臥利」是什麼意思?如果周慧海即是慧海,可以推斷,他 在仁孝皇帝初年進行翻譯佛經的工作,不僅翻譯了密教經典,而且也將《華嚴 經》注疏翻譯成西夏文。慧海與《華嚴懺儀》中所列西夏諸位弘揚華嚴的國師 和帝師之間到底存在什麼關係?有待以後再做探討。

此外,《大方廣佛華嚴經注由義釋補》(西夏特藏第 349 號、館冊第 7211 號)還提到發願者、僧人「高慧尊」。⁶⁹《南裴休禪師隨緣集》(西夏特藏第 398 號、館冊第 2610 號)結尾處重複經題,題記為「發願者、五臺山沙門張善廣文、疏檢校者,皇孫之師士、番大學院正、群牧司承旨及論師釋力亞,重證義者、番三學……師子(博士、先生)衄囉法寶」等。⁷⁰高慧尊和衄囉法寶也為推動華嚴經典的流行起了一定作用。

如此之多西夏國師、帝師、僧人參與弘揚《華嚴經》經典和思想,可見西 夏統治者和佛界對《華嚴經》重視。國師和帝師是西夏高級僧官,負責功德司 事物和皇家一些佛事活動。根據黑水城出土漢文佛經文獻題記多次記載,仁孝 皇后羅氏等施經中既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也有太原崇福寺沙門澄 觀校勘詳定譯《華嚴感通靈應傳記》等。

西夏《華嚴經》流行除與其在西北地方發展傳統有密切關係外,還與華嚴宣導的「入世」、「圓融」和「事事無礙」等思想有關。《華嚴經》認為「悟入法界,隨順法界」是佛教全部修行中的關鍵性的環節,強調通過世間學習,吸收外道的思想,突出世俗生活是通向成佛的必要途徑。《普賢行願品》突出了普賢的「十種廣大行願」即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大供養,懺除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恒順眾生,普皆回向,把悟入和深入「法界」當作其最後的歸宿。華嚴思想與淨土信仰、禪宗思想融合也促使西夏《華嚴經》廣為流行。另外,還與西夏文殊信仰興盛有著密切關係,《華嚴經》中多處提及文殊信仰,文殊信仰在河西地區歷史悠久,歸義軍時期,在莫高窟開鑿第61窟為「文殊堂」。德明時期曾派人往佛教聖地五臺山禮佛,元昊與宋交惡,雙方關係緊張,去五臺山禮佛不暢,於是在賀蘭山建立小五臺山以滿足西夏人供奉文殊需要。

綜上所述,通過對遺存西夏文、漢文《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以及論 疏的梳理,考證和探討了西夏故地出土的西夏文和漢文《華嚴經》不同版本及 帙號等,可以確定西夏文《華嚴經》有西夏時期版本,有元代印刷版本,可以 確定,西夏時期曾經刊印過西夏文大藏經,並形成一套帙號體系。對《華嚴懺

⁶⁹ Е.И.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521.

⁷⁰ Е.И.Кычанов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стр. 585.

儀》題記、洛陽白馬寺《故釋源宗主宗密圓融大師塔銘》以及洞窟題記的分析, 考證了在西夏時期傳承華嚴的諸多僧人,西夏時期還形成一定的華嚴傳承,充 分說明西夏、元時華嚴信仰的興盛。

參考文獻:

1、原典文獻

- 《華嚴懺儀》。《卍續藏》,冊 128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94 年。
-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5,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 印行,1943年。
-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九)。《影印宋磧砂藏經》冊 586,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印行,1943年。
- 《元史》。卷 18《成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纂(2005)。《英藏黑水城文獻》(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纂(2007)。《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
- 2.中日文專書、論文
- 牛達生(1996)。〈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發現研究及版本價值〉,《印刷與設計》總 120 期。
- 王國維(2001)。《觀堂集林》,卷2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史金波(1983)。〈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3 期。
- 史金波(1988)。《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石宗源主編(1999)。《張思溫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 史金波(2000)。〈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西夏文文獻初探〉,《敦煌研究》3 期。
- 史金波等編(2005)。《中國藏西夏文獻》(第 12、13、15、16 冊),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 白濱(2006)。〈寧夏靈武出土西夏文文獻探考〉,《寧夏社會科學》1期。

- (日)西田龍雄(1975、1976、1977)。《西夏文華嚴經》(1-3 冊),京都: 京都大學文學部。
- 李逸友編著(1991)。《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李富華、何梅(2003)。《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李際寧在(2007)。《佛教大藏經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譯(1994)。《黑城漢文遺書敘錄》,銀川:寧夏人 民出版社。
- 洛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1996)。《洛陽市志》,卷 15「白馬寺·龍門石窟志」,《故釋源宗主宗密圓融大師塔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俄羅斯社科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1996)。《俄藏黑水城文獻》(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北平:1932年。
- 陳炳應(1985)。《西夏文物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崔紅芬、文志勇(2006)。〈西夏皇帝尊號考略〉,《寧夏大學學報》5 期, 全文被人大複印資料《宋遼金元史》2007年1期轉載。
- 崔紅芬(2010)。〈僧人慧覺考略〉,《世界宗教研究》年4期。
- 崔红芬(2013)。〈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再研究〉,台北, 台湾大学主办第二届东亚佛教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 楊繩信(1984)。〈論「磧砂藏」〉、《文物》8期。
- 塔拉等主編(2008)。《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第8冊),北京: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
- 羅炤(1983)。〈藏漢合壁 「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4期。
- 聶鴻音(2004)。 〈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中的兩個年號〉, 《固原師專學報》5期。
- Е.И.Кычанов (1999) ,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